

作为文化区域之“湘东”界定

陈立人^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研究和发展地域文化, 首先应明确它的地域性。罗霄山西麓、湘江沿岸及其东, 即以株洲为中心, 包括长、株、潭、衡阳市之衡东、衡南、安仁、耒阳、常宁, 北起岳阳之临湘、汨罗、平江, 南至郴州市之桂东、汝城、资兴之湖南地域, 具备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较稳定的行政区划历史及相对接近的居民生存方式, 且族群和方言同源, 故可界定为湘东文化之区域。

关键词: 地域文化; 湘东; 株洲

"East Hunan" Defined as a Cultural Zone

CHEN Lire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prerequisit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culture lies in making sure of its geographical identity. East Hunan cultural zone contains west of Mount Luoxiao, the area along Xiangjiang River and the area east of the river. Or putting it in another way, east Hunan centers around Zhuzhou, comprising Changsha, Zhuzhou, Xiangtan, Hengyang's Hengdong and Hengnan, Anren, Leiyang, Changning, north Hunan's Yueyang's Lingxiang, Milu, Pingjiang, south Hunan's Chenzhou's Guiding, Rucheng, and the part of Ziking inside Hunan, where geographical natural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zoning history stable, residential living way of life similar, origins of nationalities and dialects the same.

Key words geographical culture; east Hunan; Zhuzhou

地域文化即特定区域中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它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的总合。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 使各地的文化形态也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如汉文化、关陇(三秦)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松辽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应当着重指出的是, 地域文化形成之首先条件, 就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换言之, 相对独立之区域是地域文化发生发展的基础。湘东文化作为地域文化, 也应当具有特定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要研究、发展湘东文化, 必对湘东这一特定地域有较为科学的界定。

关于“湘东”地域的说法, 大体有四种: 一是湘江以东之湖南属地即大体上包括今岳阳、长沙、湘潭、衡阳、郴州五个地级市之大部和株洲之全部; 二是按照我国传统的五行地域观念, 指的是除湘北、湘南、湘西之外的湘江以东的湖南属地即今长沙、湘潭、衡阳、郴州四个地级市之大部和株洲之全部; 三是自三国时起的“湘东郡”; 四是按今行政区划, 仅指株洲市(株洲市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天元区、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

以上对湘东地域的界定, 大体分为两个角度: 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应当说, 按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划界定湘东地域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按自然地理划分, 古籍已对湘东有初步认识: “荆之东界

^① 收稿日期: 2008-10-14
作者简介: 陈立人(1948-), 男, 湖南攸县人,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员, 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和文化、教育研究。

准约略言之,盖自麻城、黄冈,踰江而南为武昌县;又西南为通山、咸宁、崇阳、通城;又南为浏阳、醴陵、攸县、茶陵;又东南为兴宁、桂东、桂阳;又西南为宜章,皆分界处也。”^[1]其“又南为浏阳、醴陵、攸县、茶陵;又东南为兴宁、桂东、桂阳”云云,大体正合上文关于“湘东”地域的一、二两说。

上文关于“湘东”地域的三、四两说是按历史或现实的行政区划划分,“湘东”具有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因为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的,我国尤其重视运用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使不同的政区内物质交流、人员交往具有特定的环境;使辖区内生活方式和语言等同邻近的政区相异。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都是地域文化的决定因素。但从研究地域文化(包括湘东文化)的角度来看,纯粹用古代的或现代的行政区划是不够确切的;同样,纯粹以自然地理条件划分也失之偏颇。因为地域文化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区域的形成。经济区域是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而具备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其形成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和人文环境(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科学技术等)两大因素决定的。从空间上讲,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使同一自然屏障范围内的文化易于交互影响;从时间上讲,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接近,也使该地区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加上民族活动对文化区域变化的作用,此地区与其毗邻地区会有显著的差异。

以大河、大山等自然屏障来划分地区以及这一地区的文化,具有一种模糊的准确性,比用某一时代的行政设置来划分更加确切,也更加稳定。据此,则湘东包含之域,当为罗霄山西麓,湘江东岸以株洲地区为中心,包括长、株、潭三市和今衡阳市之衡东、衡南、安仁、耒阳、常宁,今岳阳市之临湘、汨罗、平江,或可延伸至郴州市之桂东、汝城、资兴等。

本界说的理由如下:

一 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般来说,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具备相对一致性来划分的。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湘东西界为湘江,东界为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湘江、赣江及北江部分水系的分水岭和发源地,是湘赣两省边境山脉。一般指袁水和渌水

谷地以南,包括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等山地。由于受“多”字型构造控制,表现为岭谷相间,镶嵌斜列。武功山主要由上古生界及中生界地层和印支——燕山期岩浆岩组成,呈东北向隆起;万洋山和诸广山主要由燕山期岩体及古生代地层组成,为南北向隆起,地貌上表现为层峦叠嶂,山岭高大。万洋山区的南风面海拔 2120 米,八面山主峰石牛仙 2042 米,诸广山的齐云峰 2061 米。

山区经多期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著名的有汝城白云仙、茶陵邓阜仙、桂东川口等地的钨矿,茶陵潞水的磁铁矿,茶(陵)醴(陵)煤田与资(兴)汝(城)煤田。又由于山区气候温暖湿润,生长松、杉、楠、樟、毛竹等常绿针叶、阔叶树种,有大量热带区系植物分布,如炎陵县低山沟谷有红勾栲、蕈树、光叶白兰,汝城有桃金娘、百日青、凤凰楠、广东厚皮香、白桂木、罗浮栲等。万洋山中的桃源洞至今还保存面积约 3400 公顷的天然常绿、针阔叶林区。八面山有杜仲、福建柏、银杏、银杉、红皮紫茎、银鹊树、南方铁杉、红豆杉等珍稀树种。林区栖息短尾猴、水鹿、林麝、华南虎、金钱豹等野生珍贵动物。可见这里地上地下资源丰富,尤其矿产和林业基础雄厚。

罗霄山涧水充沛,千回百转,交汇成江。在整个湘江东部,自成水系。一是耒水。耒水发源于桂东屏水山(炎陵之南),流经桂东、汝城、资兴、郴县、永兴、耒阳、衡南、向西北汇入湘江。二有发源于桂东风流山(炎陵之北)之洙水。汇合濂水、罗浮江、云秋水、河漠水于双江口而成,经茶陵、攸县汇入攸水,在衡东入湘。三是耒、洙二水之间的永乐江。永乐江汇安仁、炎陵、茶陵、耒阳、衡南之小溪水,左右穿插,西至衡山而汇入洙水。四是发源于江西萍乡芦溪的淅江。经醴陵而在今株洲县城(淅口镇)西流入湘江。^{[2]667}五是发源于罗霄山脉的大围山北麓,由大溪河和小溪河两个源流汇成的浏阳河,在长沙市的陈家屋场注入湘江。六是东源出江西省修水县境、西支出湖南平江县东北境之龙璋山的汨罗江,在平江县城西双汇合后,向西流到汨罗市磊石山,注入洞庭湖。

在这一素有“平行山谷”之称的“雁行式华夏向山地”,^[3]区域内的先民居住点和人口聚居的城邑,都是沿着罗霄西麓和湘江东岸诸水排列的。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战国秦汉时期,先民有洞穴和林木解决居住,有土地以种禾稼,有山林可供狩猎。茂密的山林、树枝状水文网和平坦的山谷,使该地区水旱之灾

不重而农、林、牧、渔业协调发展;交界之地的穿山峡谷,是山区之间的重要通道。其山水形势,对于先民的自卫和生存有利,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天府之域。和平时,可通过湘江及其支流,通过山谷等众多通道,与域外进行广泛的交流,乃至促进地域的扩展。总之,这种自成体系又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恒定的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和矿产条件,使同一自然屏障范围内的文化易于交互影响而自成特色。

二 较稳定的行政区划历史

行政区划是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所划分的区域。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统治者划分行政区域时要考虑自然地理要素。如秦代巴郡,是川东折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有时,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如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把秦郡的内史一分为三,使关中平原支离破碎;又因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也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以“湘东”为名设行政区始于三国时期,纵观历史,“湘东”行政区域的划分,当属于历代统治者考虑自然地理要素的划分。

先是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沙国,东汉为荆州长沙郡,“长沙郡汉置。统县十,户三万三千。知临湘、攸、下隳、醴陵、刘(浏)阳、建宁、吴昌、罗、蒲沂、巴陵。”^[4]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后,“孙权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苍梧立临贺郡,分长沙立衡阳、湘东二郡。衡阳郡吴置,故属长沙。统县九,户二万三千。主湘乡、重安、湘南、湘西、烝阳、衡山、连道、新康、益阳。湘东郡,吴置,故属长沙。统县七,户一万九千五百。古临烝、酃、茶陵、临烝、利阳、阴山、新平、新宁。”^[4]显而易见,以上所谓长沙郡、湘东郡、衡阳郡与本文所谓的湘东,即北起汨罗平江,南到常宁桂东的长、株、潭、衡地区是大体对应的区域。晋置湘州,领长沙、桂阳、零陵、衡阳、营阳、湘东、邵陵、始兴诸郡。晋之湘东郡依例领茶陵、新宁、攸、临烝、重安、阴山5县。宋、齐、梁、陈仍之。晋、宋、齐、梁、陈的长沙、湘东、衡阳三郡,亦庶几与本文所述之湘东地域相近。

在我国,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长治久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

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政区划分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对比之下,历史上该地之区划的变动很小。南北朝梁时,梁武帝萧衍为了避免前代皇族间骨肉相残局面的重演,取消了宋、齐两代监视和限制皇族权力的典签制,给皇族以实权,出任方镇。在以其子梁简文帝称皇太子时,封其第七子萧绎为湘东王(后来的梁元帝),并任荆州刺史。所辖地域包括两湖,兼督湘州及附近诸州军事。隋初,将攸水、阴山、建宁、茶陵四县并入湘潭县(非今湘潭县),属衡山郡。改湘东郡治所临烝为衡阳县,以衡州领常宁、攸、茶陵、衡阳县。以上地域,五代属潭州,宋属衡州,元属天临路,明属长沙府,民国属湘江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属衡阳专区;1952年改属湘潭专区(专区后来改称地区)。1983年7月,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改属株洲市。原湘东郡之常宁和衡阳县今属衡阳市。

综上所述,湘东郡作为行政区划所辖的范围其间虽有变动,也不过两点:一是个别县调入他郡;二是地域行政区的名称改动或改州为府。但湘东作为行政区划在历史上是比较稳定的,长沙、衡阳(山)、湘东三郡或府的属地基本不变。这说明,今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北部地域在自然地理环境上和行政区划上的联系是紧密的,更说明湘东地域文化的形成有自然地域和行政区划分的统一作为基础。

这里要附带指出的是,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炎陵县从1983年起隶属于株洲市,是国家为推进该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重大举措,更贴近湘东自然地理,是结合了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双重因素的正确选择。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还是地域文化的建设上讲,其意义上都不可低估。

三 相对接近的居民生存方式

相对完整独到的自然地理要素(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和较稳定的行政区划历史,使湘东地域生产生活的方式,即生产、民居、饮食、婚丧、礼俗、民间信仰,都形成了对内的相容性和对外的独特性。山区、小河谷和小平原交叉,有利于农、林、牧、渔业协调发展。其耕种业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薯类(马铃薯、土豆、洋芋、甘薯、红薯、白薯、木薯)、豆类、油料、棉花、麻类、烟草、蔬菜、水果、茶、中药材;其畜牧业是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的孵化和饲养;其渔业为内陆水域养殖和捕捞活动;其林业是杉、桑、梓、樟、竹的保护、种

植和开采。湘东的农、林、牧、渔业能够基本满足本地自然经济时代的消费需要并外销。湘东民居构架采用“三间四架”的形式。房屋的空间高大通敞,便于通风驱湿、古代以夯土或田泥作土砖,后以柴火青砖、煤窑红砖砌墙。青瓦白粉墙具有造型均衡简洁,色调素净明雅的特点。湘东饮食风味不同于湘北的湖区和湘西,更有异于南粤。《湖南土特产》书中称:“辣椒全省均产,但以衡山、攸县、邵阳出产较多。”湘东满山遍岭广栽油茶,田土中栽培油菜。食用油为茶油、猪油、菜油三者并用。南宋杨万里《夜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描绘的就是湘东油菜连片的乡间美景。湘东饮食制作精细,用料广泛,品种繁多,油重色浓,讲求实惠,注重鲜香、酸辣、软嫩,尤以煨菜和腊菜著称。

该地域的礼俗、民间信仰也有不同于外者。礼俗、民间信仰同湘东作为炎帝神农氏休养生息之土和陵寝之地有关。^[5]史载汉代以前有帝陵唐代奉祀以昌。正月初一敬神农,炎帝陵一带到陵前朝拜,不能用狗肉祭。农历六月六日是“坡公节”,家家晒衣晒家用品,炎陵一带还用红纸剪成上衣贴于蔑条,插之田、塘、煤井,以求五谷丰登,周遭平安。农历六月新谷登场有尝新(吃新米饭)和第一碗新米饭给狗吃的习俗。天旱又有以竹椅或竹轿抬狗向神农(龙)求雨的礼仪。因为狗是神农寻嘉禾时的化身。^[6]农历8月18日神农生日,炎陵、桂东、江西宁冈、遂川一带均祭拜炎帝,另外,炎陵、茶陵的火龙会,南岳衡山对祝融氏的祭奠,湘潭、湘乡的“挽火龙”以及湘东地区对灶神的崇拜,均带有火文明、农业文明的色彩,体现了该地域内宗教和民俗的同一性。

“火”之外,“茶”、“禾”、“耒”在湘东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湘东农村称中草药为“茶”,炎帝“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7]其活动之地,曰茶乡。明崇祯十二年命县为嘉禾,源出炎帝寻禾种禾的传说。湘东农村以水稻中耕,执木竹棍而“来(耒)田”,源出“庖牺氏没,神龙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蓐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焉。”^[8]耒水耒山耒阳的地名,正是这一文明的丰碑。实际上,对神农和耒的崇拜,源于对雷电的自然崇拜。

据笔者考证,炎陵县古名酃县是汉之酃县(汉酃)的移用。^[9]汉酃即今衡阳市城东及衡南县一带,属长沙郡(见《后汉书·郡国志》)。汉酃县治在湘江之东,耒水之西,为耒耒二水所夹的今衡阳市东酃

湖区。“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谓之酃酒。”^{[2]569}查谭其骧《中国古代地图》汉酃在春秋时名曰宠(宠)、庞(庞)。汉酃至东晋并入了县治在湘江西岸的临蒸县后,至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湖南安抚使曹彦和以“诸洞辽远,难于镇压,议设县以治之。”奏准朝廷后,^[10]合并当时的茶陵军(县)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为县,治在霞阳,始命酃县(宋酃)。汉酃(衡阳)由耒耒二水之尾(入湘处)移用于耒耒二水之源宋酃(炎陵县),这不只是空间的变动更是观念文化联系的铁证。“酃”之偏旁“雷”同雷、电、震、霆为同一个词族,炎帝创制的工具“耒”,其读音同“雷”、“雷”。炎帝号神农氏,“酃”又名曰宠(宠)、庞(庞),以湘东地区敬奉雷神、闻雷辍耕、“戊月忌动土”的习俗印证之,说明物名同时反映了先民对雷电由自然崇拜到龙之神灵崇拜的认识过程,是古人对雷电自然现象的文字记录,也是我国龙崇拜源于雷电崇拜的一个典型例证。这不是巧合,也不仅仅是个宗教信仰问题,而是积淀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精神。在神话、传说和信史融汇的观念形态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可证长、株、潭、衡属同一文化区域,即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历史文化上的联系十分紧密。

2006年5月,炎帝陵祭典顺利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炎帝陵祭典”已成为一个涵盖音乐、舞蹈、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文化载体。

四 族群和方言同源

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会有相对明确的范围。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需要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在各文化因子中,族群、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其中族群、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

族群和方言是地域文化之标识。湖南自称楚,其实楚主要是一个地域的称呼,事实上,直到战国时期,湖南作为楚国的附庸,仍是少数民族聚集地。自汉至明末,千余年间,湖南地广人稀。人口基本上是移民而来。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在湘北形成官话区。浸淫至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清初,三藩之乱,以致“烽火连绵数载,残毁瓦

砾,荆榛千里,如一青燐,白骨所在皆然。”^[11]除聚集在湘西的少数民族除外,其居民之族群分布:一是岳阳、常德、益阳湘北一带,居民口音、生活习惯甚至民风、性格同湖北,似为湖北江汉平原的延伸。二是永州、郴州、湘南一带,和广东福建江西的客家人同属一宗。这也可以从语言和生活习惯上找出很多相同点。三是包括长株潭、衡阳的湘东一带及邵阳、娄底、怀化,大部分是江西移民。

株洲县磨山遗址第一期和独岭坳第二期遗存表明大溪文化时期,湘东地区已是长江下游浙赣地区与中游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醴萍通道作为文化与交通的走廊 6000年前就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湘赣自古南楚地,“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12]居民多来自东方,主要是江西,据相关统计,外省人移入湖南者,五代至北宋,江西占十分之九,南宋至元代,江西占六分之五,明代为移民极盛时期,江西籍仍为主体。湖南的江西移民基本上来自赣中、赣北,很少发现来自赣南的。从有关的一些谱牒、史志、文物和地名来看,江西移民量以明末清初为最。根据 1982年攸县人口普查统计报告,攸县境内共有 309个姓氏。其中万人以上的姓氏有 19个,其人数达 437992人,占 1982年全县总人数的 66.68%,而人数最多的姓氏是刘姓,刘姓人口为 83805人,占当时攸县人口的 12.76%,自唐而明清历朝,此姓多为由西西安福、莲花、吉州、永新迁入。

由于江西的大量移民,这些地区程度不等地受到了赣语的侵蚀。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湘语中也都有一些赣语的特点。湖南的赣方言区分布在临湘、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安仁、永兴、资兴、耒阳、常宁、隆回、洞口、绥宁等市县,湘东一带竟因

此成为赣方言区。该片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另外,赣方言的“吃点子”的“子”、妹子的“子”读音为“叽”(ji),这一类似于词尾的读音,遍布于湘东方言中。这也是历史上江西的大量移民定居于湘东的佐证。当然,湘东之为赣方言区,除了江西移民较为集中于此外,还与湘东有较好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政区延续的历史较长和居民跟外在世界的交流不多等有关。族群和方言的特色,是界定一个地域的佐证,更是湘东区域文化圈存在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胡渭.禹贡锥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2] 酈道元.水经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5 567.
- [3]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地理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
- [4] 房玄龄.晋书·志第五·地理(下)[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7.
- [5] 罗泌.《路史》记: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
- [6] 巫瑞书.南方民俗与楚文化[M].长沙:岳麓书社,1997: 50
- [7] 皇甫谧.帝王世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8] 易·系辞:下卷[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9 134
- [9] 陈立人.“酈”一雷电与神龙崇拜的文字记录[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3).
- [10] 茶陵县志[M].清同治版.
- [11] 蒋军凤.湘东赣语的由来[J].湘东文化,2009(1).
- [12] 司马迁.史记·食货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骆晓会